

唐代文化與外來文化

邱添生

一、序 論

中國是世界上的文明古國之一，不但經過數千年綿延不絕的悠久歷史，而且擁有無盡藏輝煌燦爛的高度文化。綜覽中國歷史，波瀾起伏，蔚爲壯觀。結束春秋戰國之混亂局面而建立的秦漢帝國，於公元三世紀頃崩潰之後，即又呈分裂的局面，其間經過種種的變化，迨至隋唐之時，南北復歸一統，國威強盛，經濟繁榮，在中國中古時代是空前的，於當時世界上也是僅有的，藉着這個深厚的基礎，唐代文化承襲春秋戰國時代的哲學思想，秦漢帝國時代的制度組織，以及晉六朝以來的社會形態，同時又吸收外來文化的各種新因素，經過相當的消化融合，使中國文化的領域較前廣拓，內容更爲豐富，蔚成中國文化的高峯，也是當時世界文化的頂育。

在中國文化史上，如果以春秋戰國可比諸西方世界的希臘，則盛唐時代似可比諸羅馬。蓋羅馬文化是接承希臘的傳統，又因日耳曼民族的入侵而吸收四鄰外族的文化，遂創造具有特色的文化類型；盛唐文化則是承襲前代的傳統，又因南北的統一而與四周外族水乳交融，也形成一種空前未有的文化類型。

筆者撰述本文之要旨，即在說明唐代文化與外來文化的關係，尤其注重外來文化輸入唐朝的背景，兼論述唐代文化中所含外來文化的諸要素，進而闡明唐代寬容外來文化在歷史上的重要意義，庶幾對於有唐一代之史實，有更深入的體會與更確切的認識。

二、外來文化輸入唐朝的背景

隋唐帝國結束了數百年分裂的局面，使南北復歸統一，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很重要的時期，而李唐盛世，更由於完備的律令制度，造成了高度的繁榮與安定。當時中國與外族接觸頻繁，雙方互有往來，中國漢民西出關外者，已頗不乏人，而四周外族來住唐朝者，更所在多有。吾人研究唐代所受外來文化的影響，勢必先究明其種種的背景，以及彼此的關係，然後纔可求得真正的理解。

(236)

1 唐朝對外族的態度及政策

中國歷來素有華夷之辨，然至唐朝帝國却一變歷來的觀念，而主張華夷一家的大同精神，此為中國歷史上的一大轉變，實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朱子語類卷一三六歷代類三云：

唐源流出於夷狄，故閨門失禮之事不以為異。

雖然朱子之語極為簡略，但已指出唐朝皇族的源流問題，此對於唐代史事至為重要，乃治唐史者所不容忽視。究竟李唐氏族是否果出於夷狄，學者之間，頗有論說（註一），雖尚無確切證據以下定論，但若觀其女系母統，則高祖之母為獨孤氏，太宗之母為寶氏，高宗之母為長孫氏，皆係胡人後裔，而非純粹漢族，則李氏胡化之深，固無庸論矣。據近代人種學家之言，謂混合種優於單純種，則李唐帝國的隆盛，未始不與此有關，張星烺氏贊同此說（註二），日本宮崎市定博士也認為一味地去追究李氏果為中原漢族抑或北來異族，似是無益，吾人只能謂漢末以來業已文明化並趨下坡的中原社會，因北族的侵入而更生，至唐乃出現面目一新的社會（註三）。

自晉六朝以來，北方胡族入侵中原，漢胡之間經過相當的雜居與混合，可說已形成了一個新生的民族，而且李唐皇室，源於北朝望族，在母系血統上已相當地胡化，夷夏之分，逐漸淡薄，所以對於夷狄的態度，能够一改前代卑視之意，反具不加猜忌之心。資治通鑑卷一九七太宗貞觀十八年（644）十二月條云：

上曰：夷狄亦人耳，其情與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澤不加，不必猜忌異類，蓋德澤洽，則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則骨肉不免為讎敵。

太宗對於外族，不加猜忌，兼愛如一，所以能有突厥可汗與南蠻酋長同於唐朝宮廷起舞詠詩的場面（註四），所謂「胡越一家」，誠得其實。此種寬待外族之舉，甚至對於所獲俘虜亦然（註五），正足以說明唐室對夷狄並無畛域之見。又當時許多外族商賈，自海路入唐，在中國南方諸海港從事貿易，為了保障此等蕃客的商業利益，文宗曾特別詔諭「不得重加率稅」（註六）。再者，唐代外族居住中國境內，似乎會享有一部分的治外法權。故唐律疏議卷六名例「化外人相犯」條云：

諸化外人同類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異類相犯者，以法律論。

其疏議更加以詳細說明，曰：

化外人，謂蕃夷之國別立君長者，各有風俗，制法不同。其有同類自相犯者，須問本國之制，依其俗法斷之。異類相犯者，若高麗之與百濟相犯之類，皆以國家法律論定罪名。

觀此可知唐朝對來住外族的處理方針，尤其是關於犯罪行為的事，已明載於法典之中。唐朝既能善待夷狄，不加猜忌，夷狄也頗

能感恩，傾心唐室。當太宗駕崩之際，在唐的外族人士慟哭不已，且有自請殺身殉葬者（註七），甚至在域外被擒的外族，竟也感念其厚恩。資治通鑑卷二百高宗顯慶三年（658）十一月條云：

阿史那賀魯既被擒，謂蕭嗣業曰：我本亡虜，爲先帝所存，先帝遇我厚而我負之，今日之敗，天所怒也，吾聞中國刑人必於市，願刑我於昭陵之前，以謝先帝。上聞而憐之，賀魯至京師，甲午，獻于昭陵，赦免其死。

太宗對外族寬待無猜之誠，外族對唐帝愛戴効命之忠，於此可見。不過，及唐末僖昭之時，蕃將李克用仍不失臣節，而朝廷却「以其戎狄之人，疑而不信」，顯已有違唐初華夷一家之精神，宋人范祖禹便指摘此爲導致唐亡之一因也（註八）。

唐朝由於國力充實，繁榮安定，因此一般人民對任何事，都似乎比較關心，有高巖氏謂唐人「不宥於舊時固定的因襲，而洋溢着比較自由的氣氛」（註九），深得其旨。又因唐與四夷接觸頻繁，外族相繼來往者甚衆，所以唐人對於外國異域的事，頗爲留心，唐代野史、雜記、小說特多者，正以此也。至於唐朝對於外國之事，尤爲重視。宋郭若虛圖畫見聞誌卷五故事拾遺條云：

唐貞觀三年，東蠻謝元深入朝，冠烏熊皮冠，以金絡額毛帔，以韋爲行膝著履。中書侍郎顏師古奏言：昔周武王治致太平，遠國歸款，周史乃集其事爲王會篇，今聖德所及，萬國來朝，卉服鳥章，俱集蠻貊，實可圖寫貽于後，以彰懷遠之德。上從之，乃命閻立德等圖畫之。

唐朝特地圖寫諸外族之服飾（註一〇），其對外國事務之關心可見。唐代並在兵部的職方，設有專官，掌理四夷歸化之事（註一一），尤有進者，又遣使察訪四夷的風俗物產，撰成圖志，俾能更瞭解四夷之地。唐會要卷三十六修撰條云：

其年（顯慶三年）五月九日，以西域平，遣使分往康國及吐火羅等國，訪其風俗物產及古今廢置，畫圖以進，令史官撰西域圖志六十卷，許敬宗監領之，書成，學者稱其博焉。

唐代對於外國的地理知識相當豐富，著作也多，如玄奘的大唐西域記（註一二），賈耽的海內華夷圖、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註一三）等，都是記載外國地理的名著。又杜環著有經行記一書，以親見的見聞記述西域諸國的情況，惜原本久佚，僅杜佑通典注中保存數條而已。綜此以觀，唐朝對外族的態度是寬容善待，兼愛如一，所採取的政策是積極進取，關心夷事。因此，唐之盛德，廣被遐邇。新唐書卷二一九北狄列傳贊曰：

唐之德大矣，際天所覆，悉臣而屬之，薄海內外，無不州縣，遂尊天子曰天可汗，三王以來，未有以過之。

又資治通鑑卷一九八太宗貞觀二十一年（627）春正月條云：

諸酋長奏稱：臣等既爲唐民，往來天至尊所，如詣父母，請於回紇以南、突厥以北開一道，謂之參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驛，各有馬及酒肉以供過使，歲貢豹皮以充租賦，仍請能屬文人使爲表疏。上皆許之。

唐朝皇帝被稱爲天可汗，儼然當時天下唯一至尊的君主，四夷酋長，紛來朝貢，至奏請開一「參天可汗道」。又唐會要卷二十八

蒐狩條云：

貞觀五年正月十三日，大狩于昆明池，蕃夷君長咸從，上謂高昌王麴文泰曰：大丈夫在世，樂事有三，天下太平，家給人足，一樂也；草淺獸肥，以禮畋狩，弓不虛發，箭不妄中，二樂也；六合大同，萬方咸慶，張樂高宴，上下歡洽，三樂也。

太宗與蕃夷君長共獵，正是唐朝世界帝國的寫照，「六合大同」者，正是大同世界的理想。因此唐代來往的外族特多，並活躍於當時的中國社會，對於外來文化的輸入，有直接而密切的關係，茲擬敘述如次。

2 外族的入唐及其活動

自古以來，中國對於四周的諸外民族，常以東夷、南蠻、西戎、北狄稱之（註一四），舊唐書四夷列傳，除與唐朝關係最密切的突厥、迴紇、吐蕃等，另卷分述外，其他諸國也是分作南蠻（西南蠻）、西戎、東夷、北狄各一卷敘述。然李唐之世，四周外族，活動頻繁，變化多端，所以觀察唐代與外族的關係時，其範圍不可僅限於某一外族，而必須通覽諸外族全體的相互的連鎖關係。新唐書卷二一五上突厥列傳四夷傳總序云：

唐興，蠻夷更盛衰，嘗與中國抗衡者有四：突厥、吐蕃、回鶻、雲南是也。……凡突厥、吐蕃、回鶻，以盛衰先後為次，東夷、西域又次之，迹用兵之輕重也，終之以南蠻，記唐所繇亡云。

著者宋祁於此首先指出曾與唐朝相抗衡的四大外族，是突厥、吐蕃、回鶻、雲南，其次謂其敘述次第是以盛衰先後，迹用兵之輕重，最後記唐所由亡。陳寅恪氏更藉此闡發諸外族間的連環性，並認為唐室之亡，乃屬於外患與內政關係的範圍（註一五）。宋、陳二氏，係著重於政治軍事方面而言，固為至當之論。不過，吾人研究唐代文化所受外族之影響時，似不必過份強調此點，雖然吾人也承認外族勢力之盛衰與文化之影響不無關係，但並不是絕對性的，蓋文化之影響，往往可以超越國力的界限，例如西域文化給與唐代的影響，至深且鉅，而西域諸國却未必即為當時諸外族中勢力最強者。此種觀念必須先行確立，然後對文化一詞，始能有真正的認識。

於此特別值得吾人注意者，乃是唐代有許多外族人士入居中國，此等人士可稱為外來文化輸入中國的媒介，所以在談到唐代所受外來文化的影響時，此為一項極為重要的史實。舊唐書卷二太宗本紀上云：

是歲（貞觀三年），戶部奏言：中國人自塞外來歸及突厥前後內附開四夷為州縣者，男女一百二十餘萬口。

此一百二十餘萬的外族人士，已占唐朝當時全國人口數的四十分之一以上（註一六），對於中國發生不少影響，自無庸論。又查正史列傳明載系出外族者，也不乏其人（註一七），可見唐朝所謂華夷一家之盛況，殆得其實。

此等外族人士入住於唐之後，其所從事的活動及扮演的角色如何，尤其值得注意。首先，唐朝採取華夷一體並用的政策，外族人士乃得入仕唐廷，甚至位居中央要職，與漢人比肩於朝（註一八）。而此任職唐官的外族，似又以武將為最多，歷來史家，頗有論及（註一九）。此種重用蕃將的現象，不僅唐初如是，中葉以後，迄于唐季，莫不皆然，此或由於外族人士多屬游牧民族，性本驍勇，善於騎射，遂能致此。不僅帥兵之將領取自外族，即軍隊之成員亦多有選用外族者。舊唐書卷一〇六王毛仲傳云：初，太宗貞觀中，擇官戶蕃口中少年驍勇百人，每出遊獵，令持弓矢，於御馬前射生，令騎豹文韉，著畫獸文衫，謂之百騎。

所謂「官戶蕃口」者，殆即官戶中的外蕃，是則百騎之初創，已擇用外族人士，及玄宗之時，講武練軍，所揀取的十萬人，便也「務求灼然驍勇，不須限以蕃漢」了（註二〇）。尤有進者，唐朝且不時借用外族的兵力。高祖起義之初，即曾連好突厥，得其兵馬之助，攻取長安，創有唐之基業。玄宗天寶末年，安史亂起，亦藉廻紇、大食等國兵相助，始得討平。迨乎唐季，黃巢為亂，中原鼎沸，又藉助於沙陀人李克用的軍隊平亂（註二一）。凡此事實，均說明唐朝在軍事方面，與四周外族有極為密切的關係。

又入唐的外族人士中，也有不少是留學生，彼等對於文化的相互交流，貢獻至大。太宗之時，國學空前之盛，學生人數衆多，其中便有不少是四夷酋長的子弟。唐會要卷三十五學校條云：

貞觀五年以後，太宗數幸國學、太學，遂增築學舍一千二百間。……已而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國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于是國學之內，八千餘人，國學之盛，近古未有。

此等外族子族，既入唐朝國學，均能備受優遇，且衣糧之需，都由朝廷支給（註二二），俾其生活安定，使能專心向學。而且，外族人士與中國漢人一樣，可以參加科舉考試，也有登科進第者，例如宣宗大中初年，大食國人李彥昇即以進士第名顯（註二三），又韓國歷史學者李丙燾氏，也指出新羅人崔致遠曾於唐末考取科第，適黃巢亂起，充兵馬都統高駢的秘書官，擬就討伐黃巢檄文云（註二四）。又錢易南部新書云：

大中以來，禮部放榜，歲取三二人姓名稀僻者，謂之色目人，亦謂曰榜花。

此或為唐朝對外族應考者的特別寬待，但外族人中也不乏有才之士。又如日人阿倍仲麻呂，以文才而名顯，任職唐廷，官居三品（註二五），亦為著名之例。

外族人士以擅於樂舞的樂工、舞人而入住中國者也不少，對於唐代的音樂、舞蹈，發生極大的影響。例如德宗貞元中，有康崑崙者，為入住於唐的西域康國人，以善彈琵琶而名顯（註二六），龜茲樂更因以琵琶為主要樂器而得在唐代盛行。又唐會要卷三十三南蠻諸國樂條云：

驃國樂，貞元十八年正月，驃國王來獻，凡有十二曲，以樂工三十五人來朝，樂曲皆演釋氏經論之詞。可見當時外族向唐朝獻貢，往往有樂工偕伴而至。此外，以舞人身分入唐者，亦不乏人，甚至獲唐帝寵愛，竟得進位爲官，如高祖不納李綱之諫，竟拜出身西域安國的舞人安叱奴爲散騎侍郎（註二七）一事便是。由於許多外族樂工、舞人的入唐，使唐代流行着種種的外來音樂和舞蹈。

外族僧侶，入唐傳教，受唐室尊重，亦史有明載。例如大秦國僧阿羅本（Alopen），於貞觀九年入唐，受到太宗的禮遇，景教遂流行於中國（註二八）。又如梵僧不空，爲密教的名僧，他入仕唐廷，官至卿監，爵爲國公，歷玄、肅、代三朝，皆爲國師，備受唐室之恩寵（註二九）。凡此都說明唐室諸帝，禮遇外族僧侶，所以唐代的外來宗教，較前尤多，西方的宗教文化，更因此源源流入中國，關於其詳，下章將有論述。

在入唐的外族人士中，還有許多是從事貿易的商人。唐朝自中葉以後，消費階級漸多，商業貿易發達，所謂「商胡」的外族商人，所在多有，尤其長安城內的西市，更是商胡從事交易的大本營。此等商胡都精於貿易，對於貨色的辨識，更有漢人所不及者，例如段成式記載西市商胡以高價購得「寶骨」（註三〇），李綽記載商胡的「夜光」（註三一）等事，均可想見。迨安史亂時，由於軍用物資之需，西域商胡，更形活躍，業師佐伯富教授且認爲安史之亂便是外族商人以中國作舞臺各爲其利益而戰（註三二）。又安史亂後，迴紇以助唐平亂有功，受唐室優遇，乃有許多商胡伴隨迴紇使者入唐，滯留京師，從事貿易，因以致富。新唐書卷二一七上回鶻列傳上云：

始回紇至中國，常參以九姓胡，往往留京師至千人，居貲殖產甚厚。

此等商胡，又恃迴紇得勢，乃「目縱貪橫，吏不敢問，或衣華服，誘取妻妾」，終於使唐朝不得不加禁制（註三三）。又當時的商業貿易，不僅限於京師長安而已，且商胡之入唐，也不僅取道陸路，間亦多有從海路來到中國南方諸海港者，由於此等商胡都以貿易致富，故其船舶甚至常被劫掠。日人元開撰唐大和上東征傳，記萬安州大首領馮若芳事云：

若芳每年常刼取波斯船三二艘，取物爲己貨，掠人爲奴婢。其奴婢居處，南北三日行，東西五日行，村村相次，總是若芳奴婢之住處也。

萬安州即廣東瓊崖道萬寧縣，馮若芳則爲唐玄宗天寶年間的大海盜，盤據其地，刼掠往來的蕃船。又據李昉太平廣記，有振州民陳武振者，也因西域賈之漂舶而致富（註三四）。

吾人觀察上述唐朝對外族的態度與政策，以及外族的入唐與其活動的情形，得知唐代累積了此等種種的條件，致其寬容外來文化始有可能，同時對於唐代文化產生的原因，也可以獲得正確的理解。

三、唐代文化中所含外來文化的諸要素

基於上述的種種背景，外來文化源源流入唐朝，使中國文化發生了激烈的變化，於是唐代文化大異於前代，蓋其一而以歷來的傳統文化為主體，一面又大量吸收了外來的文化，其內容遂較前豐富，無論在風俗習慣、天文曆法、宗教信仰、樂舞美術、科學知識等方面，都因深受外來的影響而富於濃厚的國際色彩，此亦唐代文化之最大特徵，茲逐項略述如后。

1 風俗習慣

文化形態之表現於日常生活中最顯著者，莫過於風俗習慣，因為這是社會的一般現象，其產生極為自然，其性質又很單純。有唐一代，外族入居者甚多，尤其是京師長安，在貞觀之初，僅突厥流民，即已近萬家（註三五）。此等外族，流寓長安，漢人或以其為新奇，心生欣羨，漸為所化，甚至太子承乾亦然。新唐書卷八十常山王承乾列傳云：

又好突厥言及所服，選貌類胡者，被以羊裘，辮髮，五人建一落，張氍毹，造五狼頭纛，分戟為陣，繫幡旗，設穹廬自居，使諸部斂羊以烹，抽佩刀割肉相啗。承乾身作可汗死，使衆號哭、擗面，奔馬環臨之，忽復起曰：使我有天下，將數萬騎到金城，然後解髮，委身思摩，當一設，願不快邪。

胡俗影響，及於皇儲，竟作如此荒唐的事（註三六），姑不論其記載是否過份誇大其辭，而當時長安，胡風流行，應是事實。時日既久，長安少年，耳濡目染，俱有胡心矣。唐陳鴻東城老父傳云：

今北胡與京師雜處，娶妻生子，長安中少年有胡心矣。

此項記載乃憲宗元和中葉時事，所云北胡，或指突厥，陳氏為此慨歎不已，良有以也。此種胡俗的影響，不僅長安一隅而已，更且遍及全國各地，例如憲宗元和年間，唐朝政府軍平定了鎮守河南蔡州的淮西節度使吳元濟後，關於其地的風俗，資治通鑑卷二四〇憲宗元和十二年（815）十一月條云：

雖居中土，其風俗獷戾，過於夷貊，故以三州之衆，舉天下之兵，環而攻之，四年，然後克之。

其注又云：

考之漢志，汝南戶口為百郡之最，古人謂汝穎多奇士，至唐而獷戾乃爾，習俗之移人也。

此說明地方上的風俗，也頗受到外族的影響，蓋其地曾為突厥降戶所移居，遂失昔日中原敦厚之風，變為夷貊獷戾之氣。業師佐伯富教授謂此事具有重要意義，他認為這是使中古的中國社會，從根底發生動搖的巨大原動力，並在老化的中古社會中，吹進了活潑的新風氣，帶來了中華民族的返老還童，其後充滿活力的近世中國社會，業已在此逐漸萌芽（註三七），實為至當之論。

唐朝在一般的服飾方面，也備受外族的影響。劉肅大唐新語卷九從善條云：

貞觀中，金城坊有人家爲胡所奴者，久捕賊不獲。時楊纂爲雍州長史，剗勘京城坊市諸胡，盡禁推問。司法參軍尹伊異判之曰：「賊出萬端，誰能非一？」亦有胡着漢帽，漢着胡帽，亦須漢裏兼求，不得胡中直覓。

所謂「胡着漢帽，漢着胡帽」，可爲貞觀時長安漢人流行胡帽之證。唐代男女的衣帽等服飾，多悅西域之風（註三八），開元以後，更爲顯着，宮人如是，民間也相習成風。舊唐書卷四十五輿服志云：

開元初，從駕宮人騎馬者，皆着胡帽，靚粧露面，無復障蔽，士庶之家，又相倣效，帷帽之制，絕不行用。

又新唐書及姚汝能安祿山事迹，也有類似的記載（註三九）。此種胡服的好尚，自以兩京爲特盛，且至元和、長慶年間，此風仍熾，故元稹「法曲」（註四〇）詩云：

自從胡騎起煙塵，毛毳腥羶滿咸洛。女爲胡婦學胡妝，伎進胡音務胡樂。火鳳聲沈多咽絕，春鶯嚶罷長蕭索。胡音胡騎與胡徽，五十年來競紛泊。

又唐人封演，描述當代以煎茶而聞名的伯熊、陸羽等的服飾時，有「烏紗帽」、「野服」等語（註四一），似乎茶博士也以奇裝異服爲其特徵而相號召，誠有趣之事。

唐代在飲食方面，也流行着西域風的胡食。舊唐書卷四十五輿服志云：

太常樂尚胡曲，貴人御饌，盡供胡食。

在胡食之中，如饅饀、燒餅、胡餅、搭納等，都是從西域傳來的（註四十二）。長安酒肆，更有許多是胡人所經營，且以妙齡胡姬招攬客人，長安少年，趨之若鶩。李白「少年行」（註四三）詩云：

五陵年少金市東，銀鞍白馬度春風。落花踏進遊何處，笑入胡姬酒肆中。

唐代又盛行打毬之戲，所謂手毬，即波羅毬（Polo）也，這是起源於波斯的一種遊戲。杜環記載拔汗那國云（註四十四）：

拔汗那國，在恒羅斯南千里。……土有波羅林，林下有毬場。

拔汗那國即 Fergana，所謂毬場即波羅毬場也。在隋唐以前，中國早有「蹴鞠」之戲，但都是以步行足踢爲主，與波羅毬以騎馬杖擊者截然不同。此源於西陲的擊毬戲，逐漸東傳，於隋唐之際已入中國。封氏聞見記卷六手毬條云：

太宗常御安福門，謂侍臣曰：聞西蕃人好爲打毬，比亦令習，會一度觀之，昨昇仙樓有羣蕃街裏打毬，欲令朕見，此蕃疑朕愛此，騁爲之，以此思量，帝王輟動，豈宜容易，朕已焚此毬以自誠。

此記載便是唐初波羅毬已行於長安之證，雖然太宗以帝王之尊，不輕易爲之，但其後諸帝，却善於此戲，玄宗尙爲諸王時，便精於此技，雖吐蕃名手，亦所不逮（註四五）。唐帝既嗜此戲，長安的達官貴人，遂也相習成風。資治通鑑卷二〇九中宗景龍二年

(703) 七月條云：

上好擊毬，由是風俗相尚，駙馬武崇訓、楊慎交灑油以築毬場。

查楊慎交宅在靖恭坊西北隅，他所自築的毬場在坊西隙（註四六），灑油以築毬場者，旨在取其平滑，由此也可想見當時貴族生活，誠豪華之至。關於唐代打毬之戲，向覺明、羅香林諸氏，各有專文（註四七），論述綦詳。

與打毬戲的流行一樣，唐代還盛行一種鬪雞的遊戲，是否也受到外來的影響，不得其詳，但每與打毬相提並論，或不無關係，姑於此附帶言之。前云明皇精於打毬，而於鬪雞亦甚喜好。新唐書卷三十四五行志云：

玄宗好鬪雞，貴臣外戚皆尚之，貧者或弄木雞。

穆宗也喜好鬪雞，臣下相習，競玩此戲，有威遠軍監軍者，爲了討好皇帝的歡心，竟仗勢強買部下所飼好雞，並獻此戲於皇帝之前。段成式酉陽雜俎續集卷八支動條云：

威遠軍子將臧平者，好鬪雞，高于常雞數寸，無敵敵者。威遠監軍與物十疋強買之，因寒食，乃進于宅，諸王皆好鬪雞，此雞凡敵十數，猶擅場怙氣。穆宗大悅，因賜威遠監軍帛百疋。

鬪雞之戲，諸帝所好，迨至唐季，仍未稍斂，例如晚唐的僖宗，喜好蹴毬鬪雞，並引以爲樂，對於毬技，尤爲自負，謂當得狀元（註四八）。由於唐朝自天子以至諸王大臣，都喜好此戲，故在京師的大明宮九仙門外，特建有鬪雞樓（註四九），大明宮位於京城的東北角，地近皇城的宮苑，可能是專供皇帝觀賞鬪雞戲的建築物。

2 天文曆法

不論是東西方的文明古國，天文學都是自古即已發達的學問，中國歷來更是極爲重視，天文一詞，早已出現。易經卷三上經噬嗑傳賁卦云：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

此說明觀察日月星辰的位置及其動態，並藉此現象而知道時節的變化，也就是闡明天文曆法的意義。歷朝的正史中，都立有專章，詳記其事，史料齊全，故天文曆法在中國是一門極完整的學問。日本藏內清教授專治中國科學史的研究，對於歷代的天文曆法，尤有獨特見解與精詳論述（註五〇）。

印度也是天文學發達很早的文明古國，其天文曆法的知識，予中國以極大的影響。隋代之時，中國已有不少此等書籍的翻譯，查隋書卷三十四經籍志，所載印度天文曆數的書目，計有婆羅門天文經二十一卷、婆羅門竭伽仙人天文說三十卷、婆羅門天文一卷、摩登伽經說星圖一卷、婆羅門算法三卷、婆羅門陰陽算曆一卷、婆羅門算經三卷等。又查鄭樵通志卷六十八藝文略天文類

(244.)

竺國天文條，尚有西門俱摩羅祕術占一卷。此等冊籍，雖僅存其名，難考其詳，惟已傳入中國，自無疑義。又其給與隋代學術之影響如何，雖不甚詳，但既經翻譯，行於當世，則必有某種程度的影響，乃是無可否認的事情。

唐代由於許多優秀的印度天文學者來到中國，並受重用，遂使唐代的天文曆法，經過再三地改良，而有驚人的進步。唐朝二百九十年中，曆法曾經過多次的變更，但所採取的主要有三種。舊唐書卷三十二曆志一云：

但取戊寅、麟德、大衍三曆法，以備此志，示於矚官爾。

這確是三部很有價值的曆法，實有稍加簡介的必要。

戊寅曆爲道士傅仁均所造，於高祖武德二年（619）頒行。唐會要卷四十二曆云：

武德元年五月，太史令庾儉、丞傅奕上言：東都道士傅仁均，能爲曆算。于是下詔，令仁均與儉等議造唐曆，是歲九月，曆成。……明年，遂施行戊寅元曆。

唐代以前的曆法，對於確定合朔的方法，均用平朔，大抵一大月一小月相間，戊寅曆則廢去平朔，採用定朔（註五一），更爲精確。

麟德曆爲李淳風所造，於高宗麟德二年（665）頒行。同書同卷云：

至（麟德）二年正月二十日，以祕閣郎中李淳風所撰麟德曆頒于天下。……又太史瞿曇羅上經緯曆法九卷，詔令與麟德曆相參行。

由於戊寅曆仍不免有謬誤，所以李淳風造此新曆，並同時與太史瞿曇羅所上的經緯曆相參行。瞿曇（Gautama）與矩摩羅（Kumara）、迦葉（Kasyapa）是印度天文學著名的三大學派，並且都與中國的天文事務有關，例如瞿曇羅任職太史，相當於今日的國立天文臺臺長，其受唐室重用可知，也由此可見當時中國曆法確已受到印度的相當影響。

大衍曆由僧一行草定，張說成之，於玄宗開元十六年（728）頒行。同書同卷云：

開元十六年八月十六日，特進張說進開元大衍曆，命有司行用之。

又注云：

先是，九年，太史頻奏日蝕不驗，詔沙門一行判定律曆，上本顓頊，下至麟德，洎十五年，一行定草，詔說成之，因編以勒成一部，……凡五十二卷。

由此可知，開元九年，因麟德曆所推算的日蝕不效，玄宗乃命僧一行重造新曆，一行曾全面研究過中國曆法的結構，並且詳細參考了天竺的曆法，吸收其中的精華，於開元十五年草定大衍曆而卒，再由張說完成進奏。

於此尚有不能不提及者，是與大衍曆有密切關係的九執曆。新唐書卷二十八下曆志云：

九執曆者，出于西域，開元六年，詔太史監瞿曇悉達譯之。

此處所謂西域者，必指印度無疑，所謂九執，是梵語 *Nava grāha* 的意譯，也就是九曜的意思，蓋即以印度天文古來的日、月、火、水、木、金、土等七曜，及日月交叉點的計都 (Ketu)、羅喉 (Rāhu) 二隱曜，合計爲九曜 (註五二)。出身印度的太史監瞿曇悉達所編纂的唐開元占經之中，便包含了這部九執曆。在大衍曆頒行之後，未獲參與改曆工作的瞿曇讓與陳玄景曾大加反對，謂大衍曆是抄襲印度的九執曆，其中猶有未盡之處 (註五三)。雖然其反對被摒棄而告失敗，但其申訴也不無道理，蓋大衍曆之制定，頗有取材自九執曆者，且大衍曆頒行之後，九執曆仍行於民間以供參考，所以大衍曆受其影響，毋庸置疑，此實爲中國採用印度古曆之始。戴內清教授更認爲隨着九執曆的行於中國，也同時把現行的阿拉伯數字、正弦函數等數學知識傳入中國 (註五四)。

又德宗建中年間，有曹士薦作七曜符天曆一卷，謂之小曆，止行於民間，此爲五代晉天福年間所成調元曆的基礎。歐陽修五代史記卷五十八司天考第一云：

初，唐建中時，術者曹士薦始變古法，以顯慶五年爲上元，雨水爲歲首，號符天曆，然世謂之小曆，祇行於民間，而重續乃用以爲法，遂施于朝廷，賜號調元曆。

不過，此曆全是翻譯印度的曆法，王應麟已有指摘 (註五五)。由是觀之，唐代所行公私曆法，率受印度影響，徵諸文獻，斑斑可考。

關於天文觀測的方法等，也有不少是採用印度法者，例如舊唐書曆志所載，關於求算日月蝕的始虧及其復元時刻之術，便是根據印度迦葉孝威等的天竺法 (註五六)。由於廣泛地攝取了許多外來的進步天文知識，使唐代的天文觀測，極爲精確，例如李淳風曾預測日蝕的時刻，竟至「不差毫髮」 (註五七)。

又中國歷代的天文學，每與占星學雜合，而天文、占星之名，更經常混爲一談，日本今日仍信仰著大安、佛滅等的曆注，應是受到中國占星學的影響。唐代的占星學，也受到西方的影響。新唐書卷五十九藝文志三都利聿斯經二卷條下注曰：

貞元中，都利術士李彌乾傳自西天竺，有璵公者譯其文。又通志卷六十八藝文略曆數類雜星曆條亦云：

都利聿斯經二卷。本梵書五卷，唐貞元初，有都利術士李彌乾將至京師，推十一星行曆，知人命貴賤。據此知其爲占星術之書，且傳自西天竺者。

再者，與占星學有密切關係的，還有宿曜經，此爲肅宗乾元二年 (759) 北天竺的不空三藏所譯，其後代宗廣德二年 (764) 不空的弟子楊景風又加以注釋。其中對於七曜，除了梵名之外，還列舉了波斯名及胡名 (粟特語)。中國的使用七曜，主要仍是

(246)

西域曆法的影響所致。關於此項事實的詳委，早經法國學者沙畹(Chavannes)、伯希和(Pelliot)二氏發表，又經日本學者羽田亨博士介紹於東方學界。筆者曾在京都大學見到敦煌遺書影印本第一集所收七曜曆日一卷，係伯希和、羽田亨二氏共編，並附有羽田博士的解說(註五八)。至於宿曜經中所見的胡名及其種種的漢譯，可列示如左：

日	月	火	水	木	金	土
密(蜜)	莫	豐漢	臣(啗、瀝)	鵠勿斯(溫沒斯)	那歌(那頤、烏瀝)	枳泥(鷄婆)
mīr	max	wuxān	tīr	wimz	nāxid	Kēwān

其中與日曜相對的胡名的音譯「密」，歷經千百年，直至一八七〇年頃，福建地方民間所使用的曆法中，仍保留其遺痕，但一般人幾乎已全然忘却密日的意義了。雖只是所謂密日的一個區區單詞，却可出窺出千年以前影響中國之伊朗文化的紀念色彩(註五九)。

3 宗教信仰

唐代外來文化之中，傳播最廣，影響最大的，可能要算宗教了。一般而言，中國並沒有國定的宗教，中國人對於宗教信仰，一向是寬容自由的，雖然在歷史上有過排教之舉，但那只是偶發的事件，並非一項既定的基本政策，所以在中國的社會中，各種宗教都能存在，尤其在唐代，更臻極盛，也由於外來宗教的普遍傳播，促進了文化的廣泛流入，使唐代文化充滿了國際色彩。在唐代諸外來宗教中，影響最深的是自印度傳入的佛教，其次有自中亞傳入而被合稱為「三夷教」的祇教、摩尼教、景教，還有自阿拉伯傳入的回教，茲略述如后。

a 佛教 Buddhism

佛教早在西漢哀帝之時已傳入中國，其後不斷發展，漸在中國社會生根，至唐而極盛。更由於經典的譯述，高僧的弘法，乃逐漸分成許多宗派，一般分為俱舍、成實、律、法相、三論、天台、華嚴、密、禪、淨土等十宗，其中俱舍、成實二宗屬小乘，律宗通大小乘，餘七宗則為大乘。由其宗派之衆多一點觀之，即可知唐代佛教的昌盛，儘管唐朝會因被尊為道教源祖的老子與皇室同為李姓，而特別推崇道教，但在法律上，道佛兩教却同樣受到保護，故唐律疏議卷十九「盜毀天尊佛像」條云：

諸盜毀天尊、佛像者，徒三年。即道士女冠盜毀天尊像，僧尼盜毀佛像者，加役流。真人、菩薩，各減一等。盜而供養者，杖一百。

佛教在唐代的社會既已有深厚基礎，僧侶活動頻繁，例如由中國赴印度求法的玄奘、義淨，自印度入唐傳法的善無畏、金剛智、不空等，在唐代佛教界中，都是影響極大的著名高僧。玄奘於太宗貞觀三年(629)自長安出發(註六〇)，取道陸路，通

過天山南麓的北道，經由中亞入北印度，遍訪著名佛寺及學者，在印度滯留十七年，於貞觀十九年（645）歸國，他携回大量的佛經原本，多達六百五十七部，太宗更敦請他從事大規模的翻譯工作（註六一），至於有關玄奘的著作，則以大唐西域記（註六二）為最有名。義淨於高宗咸亨二年（671）自廣東出發，取道海路，經南洋至東印度，歷訪三十餘國，滯留二十餘年，於證聖元年（695）回國，武后也曾獎勵他作大規模的翻譯事業。善無畏、金剛智及不空等，都是密宗名僧，於玄宗開元年間先後入唐，弘揚祕法，因以祕密真言為宗，故又稱真言宗，其後因入唐日本僧空海而東傳，遂成為日本密宗之祖。

佛教在唐代盛行，寺廟既多，僧尼亦衆。唐會要卷四十八寺條載中宗景龍二年（708）九月並州清源縣尉呂元太上疏曰：

同書卷四十九像條又載則天武后久視元年（700）八月十五日內史狄仁傑上疏曰：

今之伽藍，制逾宮闕，……里閭動有經坊，闐闐亦有精舍，化誘所急，切于官徵，法事所須，嚴于制勅，逃丁避罪，併集法門，無知之僧，凡有幾萬。

據此可見當時佛教極盛之況，同時也發現因此而產生的種種問題，憲宗時，韓愈上疏諫迎佛骨，便公然反對佛教（註六三），這說明佛教極度發展而造成傳統知識人的一種反撥現象，其後有武宗的排佛事件。

武宗惡僧尼耗盡天下，欲去之，道士趙歸真等復勸之，乃毀佛寺，令僧尼還俗。資治通鑑卷二四八武宗會昌五年（845）八月條云：

壬午詔陳釋教之弊，宣告中外。凡天下所毀寺四千六百餘區，歸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大秦、穆護祆僧二千餘人，毀招提、蘭若四萬餘區，收良田數千萬頃，奴婢十五萬人。

此次廢佛（註六四），佛教史上謂之會昌法難，然所廢者，不僅佛教而已，實包括一切外來宗教，觀其勒令還俗者，除僧尼之外，還有大秦、穆護祆僧等，可以知之，因此，舊唐書卷十八上武宗本紀亦云：

其大秦、穆護等祠，釋教既已釐革，邪法不可獨存，其人並勒還俗，遞歸本貫，充稅戶，如外國人，送還本處收管。

不過，武宗的廢佛，實緣僧尼衆多，豁免賦役者無數，乃深惡痛絕，斷然禁教，故其出發點主要是經濟問題，並非爲了狂信孔孟或老莊而排斥異教也。且壓迫宗教本是最愚而無効之舉，尤其對於早已在中國社會生根的佛教，畢竟毫無損其流傳，所以廢佛令下後不到三年，宣宗繼位，便於大中元年（847）閏三月制勅緩和廢佛事。舊唐書卷十八下宣宗本紀云（註六五）：

雖云異方之教，無損致理之源，中國之人，久行其道，釐革過當，事體未弘，其靈山勝境，天下州府，應會昌五年四月所廢寺宇，有宿舊名僧復能修創，一任住持，所司不得禁止。

自宣宗以後，禁令略弛，故繼續流傳，今日仍存。此固由於佛教早已傳入，在中國社會根深蒂固，有以致之，而佛教的豐富經典

(248)

與精闢理論，及其在中國社會的適應性與可行性，亦未始不爲其緣由也。至於佛教傳入而波及中國中古文化的影響，桑原隲藏博士「佛教給與六朝隋唐時代文化的影響」一文（註六六），立論簡要，允爲至當。

b 祆教 Zoroasterism

祆教乃公元前六世紀頃由波斯人瑣羅亞斯德（Zoroaster）所創，薩珊王朝奉爲國教，盛行於伊朗一帶。其教旨主張善惡二元論，以火爲善神的代表，俗乃拜火，中國名之曰拜火教，又以其也拜天，故又稱之爲祆教（註六七）。此教早在北魏時已傳入，當時稱爲火神、天神或胡天神。書卷一〇二西域列傳波斯國條云：

俗事火神、天神，……神龜中，其國遣使上書貢物。

同書卷十三宣武靈皇后胡氏傳又云：

後幸嵩山，夫人、九嬪、公主已下從者數百人，昇于頂中，廢諸淫祀，而胡天神不在其列。

據此知祆教在北魏時已傳入中國。

唐時中亞一帶如康、石、安、曹、米、史等國，都信奉祆教，進而又傳入今新疆境內的于闐、焉耆、疏勒、高昌等地，再由於許多西域人相繼入唐，祆教便也在長安、洛陽兩京流行。據徐松唐兩京城坊考的記載，在長安的靖恭坊十字街南之西、布政坊西南隅、醴泉坊西門之南、普寧坊西北隅，以及在洛陽的會節坊、立德坊等處，都有祆祠（註六八）。又據張鷟朝野僉載，則洛陽的南市西坊也有祆祠（註六九）。同書卷三又記其祈祭時的幻法云：

每歲商胡祈福，烹猪羊，琵琶鼓笛，酣歌醉舞，酹神之後，募一胡爲祆主，看者施錢並與之，其祆主取一橫刀，利同霜雪，吹毛不過，以刀刺腹，刃出於背，仍亂擾腸肚，流血，食頃，噴水呪之，平復如故，此蓋西域之幻法也。

唐代又設有專官，管理祆教的事。查通典卷四十大唐官品視流內條載有「視正五品薩寶，視從七品薩寶符祆正」等官，其注又云：

武德四年，置祆祠及官，常有羣胡奉事，取火呪詛。

據此知其充任此等宗教官職者多爲胡人。又新唐書卷四十六百官志祠部條云：

兩京及磧西諸州火祆，歲再祀，而禁民祈祭。

既有祠，有祀典，又設有專官，却云禁民祈祭，可見其作用不外是對於入唐外族示以寬待之意而已。儘管如此，祆教對唐朝也曾發生影響，桑原博士發現一項新史料，指出此事，謂唐語林卷六的原注裏，載有顏真卿男碩之小名爲穆護，而穆護即 Mogu 的音譯，係祆教僧侶之意，素以嚴謹而著稱的唐朝名臣，竟以此外來宗教的名詞，稱呼其子之小名，實爲唐代文化具有國際性特色的一項證據（註七〇）。

不過，後來武宗罷黜佛法時，並毀一切外來宗教，祇教也同時遭厄，前引通鑑及舊唐書之記載已詳。且祇教在中國社會的基礎，不如佛教之深厚，自此以後便一蹶不振，漸趨式微，經唐末、五代至宋，在鎮江府朱方門之東城上及開封城北，雖仍有祇祠（註七一），但也只是微弱的殘餘了。

c 摩尼教 Manichaeism

摩尼教乃公元三世紀由波斯人摩尼（Mani）所創，以祇教學說為基礎，並參酌佛教、基督教的哲理而成，因與波斯國教的祇教相對立，摩尼竟於公元二七七年被處死（註七二），教徒多逃往中亞或印度，遂在其地流行。此教於唐武后延載元年（694）始傳中國。志磐佛祖統記卷三十九云（註七三）：

有波斯國人拂多誕持二宗經偽教來朝。拂多誕乃摩尼教的教職名，二宗經是其基本經典。到了開元七年（719）六月，又有吐火羅國支汗那王帝除上表，獻解天文人大慕闍。冊府元龜卷九七一外臣部朝貢條云：

其吐火羅國支汗那王帝除上表，獻解天文人大慕闍，其人智慧幽深，問無不知，……望請令其供奉，並置一法堂，依本教供養。

所謂慕闍，係位於拂多誕之上的一教職名，請置一法堂之事，似乎到代宗大曆三年（768）才獲實現，是年七月，奉敕而建，並賜額曰大雲光明寺，同六年正月，又敕荆、揚、洪、越等州，各置大雲光明寺一所（註七四）。憲宗元和二年（807）正月，又許迴紇使者之請，在河南府、太原府置摩尼寺三所（註七五）。於是摩尼教徒源源入中國。李肇唐國史補卷下云：

其大摩尼數年一易，往來中國，小者年轉江嶺。

大摩尼即慕闍，小摩尼即拂多誕。穆宗長慶元年（821）五月，更有迴紇宰相、都督、公主、摩尼等五百七十三人，入朝迎公主（註七六）。

關於其教規，莊季裕雞肋編卷上記云：

事魔食菜，法禁甚嚴。……聞其法斷葷酒，不事神佛祖先，不會賓客，死則裸葬，方殮，盡飾衣冠。

又其教徒每日一食。唐國史補卷下云：

日晚乃食，飲水而茹葷，不飲乳酪。

摩尼教徒，率皆食素，此云「茹葷」者，其上必脫一「不」字，新唐書卷二一七上回鶻列傳所載，也同樣誤脫，方豪氏已有指摘（註七七）。薛居正舊五代史則有「宵聚晝散」的記載（註七八）。又摩尼教師多習天文，故也稱陰陽人，唐朝廷且常令祈雨（註七九）。

唐代摩尼教與回鶻有密切關係，且因回鶻助唐平定安史之亂，立有功勳，獲得殊遇，摩尼教便恃勢發展，其僧徒甚至伴隨或

(250)

充當回鶻的使臣往來於長安，其中更有有經商者，既憑藉回鶻的政治力量，遂常在長安橫行不法。新唐書卷二二七上回鶻列傳：

摩尼至京師，歲往來西市，商賈頗與囊橐爲姦。

及會昌初年，回鶻破亡，摩尼教便失去憑依。李德裕會昌一品集卷五賜回鶻可汗書意云：

近各得本道申奏：緣自聞回鶻破亡，奉法者因茲懈怠，蕃僧在彼，稍似無依，吳楚水鄉，人性蠶薄，信心既去，翕習至難。……其江淮諸寺權停，待回鶻本土安寧，即却令如舊。

可見摩尼教徒之篤信，諸寺之被停，無不與回鶻有關，回鶻既破亡，摩尼教便趨衰落，是很自然的。迨武宗下詔排佛，摩尼寺也一併被廢，不過，在所謂三夷教之中，似以摩尼教的力量較強，性亦頑悍，故武宗禁教後，各地摩尼教徒仍紛起反抗，直到五代梁貞明六年（920），陳州摩尼教徒，竟擁母乙爲天子，旋即兵敗被擒（註八〇），但其祕密活動，迄宋猶未斂息。

d 景教 Nestorianism

景教乃公元五世紀頃由敘利亞人聶思脫里（Nestorius）所創，是基督教的一個支派，稱爲聶思脫里派。其教義主張人神兩性，謂基督與神爲兩位，故於公元四三一年被弗斯（Ephesus）宗教會議斥爲異端，聶氏及其信徒乃脫離正宗派的基督教，逃奔波斯，遂漸傳至中亞等地。

景教於唐太宗貞觀九年（635）始傳入中國，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註八一）記其事云：

大秦國有上德曰阿羅本，……貞觀九祀，至於長安，帝使宰臣房公玄齡，總仗西郊，賓迎入內，翻經書殿，問道禁闈，深知正真，特令傳授。

其下又記貞觀十二年制詔曰：

詳其教旨，玄妙無爲，觀其元宗，生成立要，辭無繁說，理有忘筌，濟物利人，宜行天下。所司即於京義寧坊造大秦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

景教初與祇教同稱波斯寺，天寶四載（745）詔改稱大秦寺。唐會要卷四十九大秦寺條云：

波斯經教，出自大秦，傳習而來，久行中國，爰初建寺，因以爲名，將欲示人，必修其本。其兩京波斯寺，宜改爲大秦寺，天下諸府郡置者亦準此。

據此可見其傳佈早已不限於長安，蓋以初來的景教僧阿羅本，既備受禮遇，故能傳佈全國。據景教碑文的記載，肅、代宗之時，仍受到唐帝的支持（註八二），但武宗下詔排教時，景教也遭受致命性的打擊，歷唐末、五代至宋，景教遂漸消失於中國矣。

e 回教 Islam

回教又稱伊斯蘭教，乃公元七世紀初由阿拉伯人穆罕默德（Muhammed）所創，他研究過猶太教及基督教，並改革阿拉伯原有的多神教與偶像崇拜，其基本經典為可蘭經（Koran），敬事阿拉（Allah），為一神教。其教徒禁食豬肉等。通典卷一九三大秦國條引杜環經行記云：

其大食法者，……不食猪狗驢馬等肉。

回教始傳中國，究在何時，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有謂隋初已傳入者（註八三），但回曆紀元起於公元六二二年，合唐高祖武德五年，在此以前，回教尚未能謂正式創立，故此說難信。又有謂武德年間已傳入者（註八四），但那只是說明已有阿拉伯商人來到中國而已，仍難作為回教傳入之確證。唯大食於高宗永徽二年（651）已正式與唐通使，則文獻可徵。舊唐書卷四高宗本紀上云（註八五）：

八月乙丑，大食國始遣使朝獻。

當第八世紀之際，回教徒勢力正盛，席捲了北非與西南歐，及公元七三二年吐爾（Tours）之役，受挫於查理馬太爾（Charles Martel）之後，始移其勢力向東，進圖中亞，遂與中國接觸頻繁，玄宗天寶十載（751），更大敗唐將高仙芝之師於怛羅斯（Talas），大食幾為中亞之盟主，取唐勢力而代之。及安史亂起，唐室垂危，也曾借大食的兵力，助討叛亂。冊府元龜卷九七三外臣部助國討伐條云：

（至德二年九月）癸卯，元帥廣平王整軍容入長安，中軍兵馬使僕固懷恩領迴紇及南蠻、大食等軍，從城南過潼水東下營。十月壬戌，遂收復東京。

元帥廣平王者，即後來繼肅宗而立的代宗，因此，唐會要卷一百大食國條云：

代宗之為元帥，亦用其國兵以收兩都。自是以後，大食兵多有安居中國而歸化者，故在武宗下詔排斥外來宗教之前，回教也曾在中國盛行一時，是可以想像的。不過，唐代有關回教的文獻紀錄太少，無法得其詳情，唯阿拉伯人善於經商，故有不少的貿易商人入唐，尤其是取道海路來到中國南方諸海港者更衆（註八六），唐末之亂，廣州之外僑被殺者，竟至十二萬人以上，其中又以阿拉伯人為最多（註八九），而阿拉伯人大多信奉回教，所以，他們入唐之時，便也把回教信仰帶來中國，乃是極其自然的事。

4 樂舞美術

唐代的中國人，對於外來的，尤其是西域的樂曲，十分歡迎，所以唐代胡樂盛行，是漢樂與胡樂融合發展的時代。不過，外國音樂傳入中國，非自唐始，蓋魏晉以後即已有西方歌樂傳入。北魏時以悅般國鼓舞，設於樂署，四夷歌舞，稍增列於太樂（註

八八)北齊之末，重用外族樂人，至有封王開府者(註八九)。及北周武帝聘突厥女爲后，更帶來不少西域的樂人，於是有龜茲、疏勒、安國及康國之樂，帝乃大聚長安胡兒，以羯人白智通任教習，頗雜以新聲(註九〇)。到了隋唐時代，則漢樂與胡樂，糅合發展，臻於極盛。

隋承齊周以來之舊，有九部樂，唐高祖時仍沿用之，太宗平高昌，得其樂部，遂增加一部，定爲十部樂，卽燕樂、清商、西涼、天竺、高麗、龜茲、安國、疏勒、康國、高昌是也，其中燕樂是唐自造，清商是漢魏以來舊樂，其餘均自外國傳入，可見當時音樂受外來影響之深。太宗雖定十部樂，但其後却僅奏九部，當是停奏清商樂。通典卷一四六清樂條云：

自長安以後，朝廷不重古曲，工伎轉缺。

古典者，似應指清商樂而言。其後，樂分爲坐、立兩部，坐部皆用龜茲曲，樂器以琵琶爲主，立部皆搥大鼓，雜以龜茲曲，唯其中的慶善樂用西涼曲。坐部伎坐奏於堂上，地位較貴，立部伎立奏於堂下，地位較賤。元稹元氏長慶集卷二十四樂府「立部伎」詩注云：

太常選坐部伎無性靈者退入立部伎，又選立部伎無性靈者退入雅樂。

雅樂爲中國固有的音樂，自古以來，素受重視，但至此已趨衰微，竟最不被重視矣。

又從坐、立二部的內容可以看出，在外來的樂曲中，龜茲樂漸盛，其最主要原因，便是龜茲樂以琵琶爲主，而唐朝君主皆嗜琵琶也。唐會要卷三十三燕樂條云：

貞觀末，有裴神符者，妙解琵琶，作勝蠻奴、火鳳、傾盃樂三曲，聲度清美，太宗深愛之。高宗末，其伎遂盛。

太宗深愛琵琶，曾有西國進一胡善彈琵琶者，太宗甚至用計偷竊其曲，又示以吾宮人亦能之(註九一)，其熱愛程度如此。其後君主如睿宗與玄宗，也都喜歡琵琶，一切新曲，更非配以琵琶不可，龜茲樂伎之最爲時尚者以此也。龜茲樂中，尙有觿箏，也曾盛行於長安，德宗朝有將軍尉遲青者，系出西域于闐，善吹觿箏，冠絕今古，並以此藝折服幽州名手王麻奴，名亦顯矣(註九二)。

龜茲樂又似與羯鼓有密切關係。酉陽雜俎卷十二語資條云：

玄宗常伺察諸王。寧王常夏中揮汗鞞鼓，所讀書乃龜茲樂譜。向達氏以爲寧王之揮汗鞞鼓，亦爲羯鼓，而龜茲樂譜則爲羯鼓譜，氏更就唐人南卓羯鼓錄中所附諸宮曲，而推定唐代盛行於長安之羯鼓，其淵源實出於龜茲云(註九三)。

玄宗之時，又有胡部新聲傳入中國。通典卷一四六方樂條的末段云：

又有新聲自河西至者，號胡音聲，與龜茲樂、散樂俱爲時重，諸樂咸爲之少寢。

石田幹之助氏先以爲胡音聲是指用胡語所唱的新來音曲，繼又贊同岸邊成雄氏之說，單解作是胡風(卽西域風)的音樂(註九四)。

）。又胡音聲傳入中國，漸演變成唐代的所謂大曲，大曲之爲梨園法部所演奏者，又稱爲法曲，霓裳羽衣曲便是最著名的法曲，這也是唐代漢樂與胡樂融合發展的最高成就。

唐代自西域傳來音樂，同時也傳來舞蹈，蓋樂與舞，每不相離，所以段安節樂府雜錄舞工條云：

舞者，樂之容也。

西域之舞，多配以樂，所以唐代盛行樂舞，關於其種類等，段氏記述甚詳，同書同條又云：

有大垂手，小垂手。或如驚鴻，或如飛燕。婆娑舞態也，蔓延舞綴也。古之能者，不可勝記。卽有健舞、軟舞、字舞、花舞、馬舞。健舞曲有稜大、阿連、柘枝、劍器、胡旋、胡騰，軟舞曲有涼州、綠腰、蘇合香、屈柘、團圓旋、甘州等。

關於字舞、花舞、馬舞，於此文之末的附注，解之已詳（註九五）。至於健舞、軟舞之名，何所取義，不甚可知，但一般而言，健舞姿勢雄健，軟舞較爲柔和，兩者都是唐代盛行的主要樂舞，則無疑也。在健舞曲中，今確知其出自西域者，有柘枝、胡旋、胡騰三種，開元、天寶以後，盛行於長安，後更遍及全國各地，試述其梗概如后。

柘枝舞出自西域石國，蓋石國亦名柘枝，又名柘羯，亦卽中亞 Ferghāna 的 Tashkend。其舞人衣彩色羅衫，胡帽銀帶，唐人詩中，多有言之。張祐「周員外席上觀柘枝」（註九六）詩云：

金絲蹙霧紅衫薄，銀蔓垂花紫帶長。

白居易「柘枝妓」（註九七）詩亦云：

紅蠟燭移桃葉起，紫羅衫動柘枝來。

白氏「柘枝詞」（註九八）又云：

繡帽珠綢綴，香衫袖窄裁。

再據唐人詩句考之，其舞法似以鼓聲爲節，起舞鼓聲以三聲爲度。白氏「柘枝妓」詩云：

平鋪一合錦筵開，連擊三聲畫鼓催。

此舞又注重目部表情，爲其特色。劉禹錫「觀舞柘枝」（註九九）詩云：

曲盡回身去，曾波猶注人。

俟舞至曲終之時，又例須微袒其衣。沈亞之「柘枝舞賦」（註一〇〇）云：

差重錦之華衣，俟終歌而薄袒。

胡旋舞源出西域康國，白居易謂出自康居，石田幹之助氏已指其謬（註一〇一）。玄宗開元天寶之際，西域的康、米、史、

俱密諸國，屢獻胡旋女子，此舞遂入中國，玄宗深為喜好，安祿山也會在帝前作此舞（註一〇二）。此舞既屬健舞之一種，則步伐極為快速。通典卷一四六四方樂條記康國樂云：

舞，急轉如風，俗謂之胡旋。

可知胡旋舞是一種像風似地旋轉的急舞，新舊唐書也都有類似的記載（註一三）。又樂府雜錄俳優條釋骨塵舞和胡旋舞云：

俱於一小圓毬子上舞，縱橫騰踏，兩足終不離於毬子上，其妙如此也。

但是，觀元、白二氏樂府，並未言及毬子的事（註一〇四），或許並非全都舞於圓毬子之上也。至於胡旋舞的舞者、樂工及其服裝等，石田氏「胡旋舞小考」一文（註一〇五），考證綦詳。

胡騰舞大約出自西域石國，劉言史「王中丞宅夜觀舞胡騰」（註一〇六）詩云：

石國胡兒人見少，蹲舞尊前急如鳥。

王中丞即王武俊，是出身契丹的外族，兩唐書均有其傳，他喜歡西域的胡騰舞，於此可知。又李端「胡騰兒」（註一〇七）詩云：

胡騰身是涼州兒，肌膚如玉鼻如鉤。

桐布輕衫前後卷，蒲萄長帶一邊垂。

帳前跪作本音語，拾襟攬袖為君舞。

所謂「肌膚如玉鼻如鉤」，則李端所見的胡騰兒為印歐族之伊朗種人可知，亦即劉言史所謂「石國胡兒」也。又所謂「本音語」者，當是其地土語。是則，出身西域石國的舞者，用當地土語，一面唱歌，一面跳舞，或即所謂胡騰舞也。

至於軟舞曲中的大部分，中國載籍已不甚可考，或從日本現存典籍中，尚可知其一二（註一〇八）。

唐代文化，普遍發達，在美術工藝方面也同樣地興盛。就繪畫而言，自魏晉以後，中國畫家已顯然受到西方畫風的影響，六朝梁的張僧繇在一乘寺寺門所繪的花，遠望眼暈如凹凸（註一〇九），乃採用印度的暈染法，這是有畫有陰影法之始。唐初流寓長安的西域畫家，最著名者當推尉遲乙僧，他與父跋質那都是以闐國質子而入住長安。元湯潤古今畫鑑唐畫條云：

尉遲乙僧，外國人，作佛像甚佳，用色沉着，堆起絹素，而不隱指。

可見尉遲氏是繼承張僧繇而復倡印度暈染法，對於唐代繪畫的風格技巧，有不少影響（註一一〇）。盛唐的吳道子，蜚聲於長安畫壇，有「畫聖」之稱，其人物畫更佳，也受到凹凸畫派的影響。宋人米芾畫史唐畫條云：

蘇軾子瞻家收吳道子畫佛及侍者誌公十餘人，破碎甚，而當面一手精彩動人，點不加墨，口淺深暈成，故最如活。王防字元規家二天王，皆是吳之入神畫，行筆磊落揮霍，如蓴菜條圓潤，折算方圓凹凸，裝色如新，與子瞻者一同。

所謂「口淺深暈成」、「折算方圓凹凸」等語，以近年敦煌所出諸絹畫及壁畫勘之，便可瞭然，唐代長安大小寺院中，乙僧及道

子的壁畫甚夥，此種帶凹凸之風的畫，亦必不少。又唐人張彥遠撰歷代名畫記，其第九、第十兩卷，列舉唐代（迄會昌年間止）能畫名人達二百零七人，若據宣和畫譜（計二十卷，宋代所出，撰人不詳），則唐代畫家有姓名可考者，更約有四百人之多，唐代繪畫之盛可見。

隨着繪畫藝術的進步，雕刻造像的技巧也逐漸提高，此亦受到西域的影響。西陽雜俎續集卷五寺塔記上請恭坊大興善寺條云：

行香院堂後壁上，元和中，畫人梁洽畫雙松，稍脫俗格。曼殊堂工塑極精妙，外壁有泥金幀，不空自西域來者。

唐朝又延攬重用外國藝術家，於中國美術工藝之影響甚大。試舉一例，資治通鑑卷二〇五則天武后天冊萬歲元年（695）夏四月條云：

天樞成。高一百五尺，徑十二尺，八面，各徑五尺。下爲鐵山，周百七十尺，以銅爲蟠龍麒麟繁繞之。上爲騰雲承露盤，徑三丈，四龍人立捧火珠，高一丈。工人毛婆羅造模，武三思爲文，刻百官及四夷酋長名，太后自書其榜曰大周萬國頌德天樞。

則天武后爲誇示大周的國威，建築了這座堂皇的天樞，當時特地招攬外國藝術家，爲其策劃（註一一）。又因佛教的廣泛傳播，更造成石窟藝術的極盛，敦煌千佛洞是壁畫和泥塑的最大寶庫，也是唐代藝術的輝煌成就。由於本世紀初敦煌石窟的被發現，使東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開了新紀元，「敦煌學」更是近半世紀來盛極一時的學問（註一二）。又唐玄宗時，密教自天竺正式傳入後，敦煌壁畫的尊像圖中，就出現了曼荼羅和婆羅門的神像，今日在日本奈良的正倉院、京都的東寺等處，仍可看到不少此等實物。

5 科學知識

唐代在科學知識領域的方面，也較前代進步良多，而且由許多文獻的記載，可以證明其受到西方外來的相當影響。前面敘述天文曆法時，曾提到隨着九執曆的行於中國，也同時把阿拉伯數字、正弦函數等數學知識傳入中國，這說明在唐代的數學知識中，又加了一種新的成分在內。數學一門學問，在唐代稱爲算學，高宗之時，曾在國學中設算學館，科學中並設有明算一科，可見唐朝對算學是極爲重視的。又因宗教與天文有密切關係，而天文離不開數學，故自佛教傳入中國後，天算也隨着輸入。唐太史監瞿曇悉達開元占經卷一〇四云：

天竺算法，用九個字乘除，其字皆一舉札而成，九數至十，空位處恆安一點。

清阮元疇人傳也有類似的記載（註一一三），此即印度算法傳入中國之一例。

(256)

在醫學方面，隋末唐初的孫思邈是一位名醫，他以「人命至重，有貴千金」（註一一四）的濟世救人觀念為出發點，撰備急千金要方三十卷，內包含三十一門、二百二十三類，可說是集唐以前醫學大成的名著。孫氏喜好佛典，「嘗隱終南山，與宣律師尚相接，每來往互參宗旨」（註一一五），故其醫學知識，受到佛學的相當影響。是書卷一論診候第四云：

地水火風，和合成人。……凡四氣合德，四神安合，一氣不調，百病一生，四神動作，四百四病，同時俱發。又云一百一病，不治自愈，一百一病，須治而愈，一百一病，雖治難愈，一百一病，真死不治。

原來佛經中有四百四病之說，謂人體由地、水、火、風四行（佛教用語稱四大）合成，每一行可發一百一病，地與火可發熱病二百二，水與風可發寧病二百二也。孫思邈的診候論法，顯然是依據佛家的四行理論。而唐代醫術受西方影響最大的，可能要算眼科了。劉禹錫「贈眼醫婆羅門僧」（註一一六）詩云：

三秋傷望遠，終日泣途窮。兩目今先暗，中年已老翁。看來漸成碧，羞日不禁風。師有金篦術，如何為發矇。

眼醫婆羅門僧替劉氏治眼疾，說明印度的眼科醫術輸入了中國。又唐僧鑑真赴日途中，也會在嶺南韶州請過胡人治眼疾（註一一七），這位胡人極可能是印度眼醫。當時西方精於眼科者，除印度之外，還有大秦。通典卷一九三引杜環經行記云：

大秦善醫眼及痢，或未病先見，或開腦出蟲。

大秦人的眼科醫術，高明若此，高宗之時，有大秦人秦鳴鶴者，曾為天子治眼疾（註一一八），更可證明大秦國的進步眼科醫術，對唐代中國醫學的貢獻。

唐代又盛行煉丹之術，唐朝天子為求延年長生，更多有餌丹藥者（註一一九），如太宗命印度方士那羅邇婆娑造延年藥，並且餌之，毒發而死（註一二〇），高宗也曾欲餌胡僧盧伽逸多所合丹藥，因郝處俊之諫而止（註一二一）。類此求長生之術，造延年之藥，固為荒唐無稽的事，但若以冶金煉丹的技術而言，似仍不失為一種化學的實驗，則又可說明印度的化學知識輸入中國，並發生影響。

所謂醫藥、煉丹，其材料多有取自動物、植物或鑽石者，因此，隨着醫術、煉丹術的發達，唐代也輸入不少新的外來動植藥物。封氏聞見記卷七蜀無兔蛄條云：

太宗朝，遠方咸貢珍異草木，……色類甚衆。異方禽獸，象出南越，馳出北極，今皆育于中國，然不如本土之宜也。

雖云不如本土之宜，但唐時中國境內已有不少「珍異草木」、「異方禽獸」可知。張星烺氏著中西交通史料匯編六冊，詳列唐人所知大秦國等地的動植藥物名稱，其中以植物最多，鑽石次之，動物最少（註一二二），蓋古代船舶小，動物沿途難於攜帶，而植物則可曬乾，或僅携種子，至為方便故也。又唐代也有不少博物學家，其中如段成式，為衆所熟悉者也。新唐書卷八十九段志玄列傳附成式傳云：

成式，字柯古，推蔭爲校書郎，博學彊記，多奇篇祕籍。

段氏撰西陽雜俎三十卷，關於唐代的外國事情及動植鑛，記載甚詳。

又談到古代東西交通史時，關於其來往的路徑方面，一般所熟悉並強調的，多是以絲路（Silk Road）而聞名的陸路交通，其實在海路方面也不容忽視，而關於航海的技術，則號稱中國三大發明（註一二三）之一的羅盤針，曾影響及於西方世界，亦爲衆所周知，然在唐代之時，有自西方傳來以鴿爲海中通信的方法，亦不失爲當時航海術的一項新知識。西陽雜俎卷十六廣動植之一羽篇云：

波斯船上多養鴿，鴿能飛行數千里，輒放一隻至家，以爲平安信。

又唐國史補卷下亦云：

南海船，外國船也，每歲至安南、廣州。……船發之後，海路必養白鴿爲信，船沒，則鴿雖數千里，亦能歸也。所謂南海船者，或即繞經南海而來中國的波斯船舶也。

此外，唐代在建築技術上，也是中古時期相當發達的時代，蓋唐時崇佛尤甚，故佛寺之建築，佛像之鑄造、裝飾、雕刻等技藝，都有驚人的進步，前記則天武后建造天樞事，卽爲顯著之例，吾人由天樞的結構，可以發現其兼採了中國、印度及西域的建築形式（註一二四）。又唐語文卷四豪爽條記玄宗之涼殿云：

玄宗起涼殿，拾遺陳知節上疏極諫，上令力士召對。時暑毒方甚，上在涼殿，坐後水激扇車，風獵衣襟。知節至，賜坐右榻，陰雷沉吟，仰不見日，四隅積水，成簾飛灑，座內含凍，復賜冰屑麻節飲，陳體生寒慄，腹中雷鳴，再三請起方許，上猶拭汗不已，陳纔及門，遺洩狼籍，逾日復故，謂曰：卿論事宜審，勿以己方萬乘也。

同書卷五補遺條又記玄宗寵臣王鉉宅云：

武后已後，王侯妃主，京城第宅，日加崇麗。天寶中，御史大夫王鉉有罪賜死，縣官簿錄鉉太平坊宅，數日不能遍。宅內有自雨亭子，簷上飛流四注，當夏處之，凜若高秋。

所謂「涼殿」或「自雨亭子」的建築，誠豪華之至，此參以舊唐書關於拂林國的記事（註一二五），則其爲仿照西域拂林之風所造，至爲明顯。

四、唐代寬容外來文化的歷史意義

中國文化原帶有大同色彩，如中庸云：「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雨露所墜，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又如論語顏淵篇云：「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卽顯示超民族的世界主義。春秋雖有夷夏之辨，但所謂夷夏，與其說

是種族上的區別，不如說是文野之分，故對於外來文化，從未採取深拒的態度。尤其經過南北朝民族的大混合，李唐皇室也有外族的血統，唐太宗又率先倡導對華夷一視同仁，加以唐代向海外大謀發展，中西交通日繁，唐人視界日寬，自然促成寬容外來文化的機運。

唐代大量吸收外來的文化，觀以上所述的種種事實，可以瞭然。尤其唐朝對於外來文化有寬容的雅量，所以頗能加以消化融合，例如德宗於降誕之日，常引沙門、道士共同講論，且謂：「三教與儒教所歸不殊，但內外跡用有異爾」（註一二六）。唯唐朝對於所有外來文化，並非毫無考慮地作囫圇吞式的接受，而是審慎斟酌地作選擇性的吸收，例如乞寒之戲，雖曾一度傳入，却因其不適於中國社會，故於玄宗開元初年終被禁斷（註一二七）。且唐朝對於外來文化，既經吸收消化之後，終又成爲一種屬於自己的新文化，例如佛教早入中國，至唐代而極盛，宗分派別，其中禪宗一派，原係印度、西域所無，而獨爲中國唐朝所獨創。就此點而言，實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

論及類此兩種文化形態的關係時，宮崎市定博士曾有獨特的論點，他首先提出樸素主義的民族與文明主義的社會二詞，並加以說明云：「若文明人有文明主義的教養，則樸素人有樸素主義的訓練。若文明人思索，則樸素人行動。前者是理智的，後者是意志的。一爲情緒纏綿，另爲直截簡明。彼爲女性的，此爲男性的。又彼爲個人自由主義，此爲全體統制主義。凡於所有方面，似都見到相反特長的對立」（註一二八）。如果以這種概念來看唐代文化與外來文化的接觸關係，則唐朝把這兩種對立的文化類型滙於一爐，融和了樸素主義與文明主義的兩種特性，進而發揚光大，終於產生了爛熟興隆的盛唐文化。羅香林氏論唐代文化，提出開創性、世界性與適應性三點（註一二九），所謂開創性與適應性，固爲唐朝吸收外來文化能力的高度發揮，但也同時伴隨着前述的各項背景，始得促成唐代文化的實現。至於世界性一點，羽田亨博士也曾言及，吾人觀察前述唐代文化中所含外來文化諸要素的史實後，毋寧說顯示了國際的多樣性，似乎更得其實。

羽田博士又提出隋唐文化的統一性（註一三〇），但若綜覽古今中國歷史的整個過程，則中國文化的統一，似乎要到近世伊始的宋代纔得完成。蓋唐代文化的發展，係因外來文化相繼傳入，並以一種新成分注入於唐的大洪爐內，唐朝具有充分的吸收力和消化力，故能根據自身發展的需要，對於這些外來的新成分，有選擇地取捨增損，再經過消化之後，愈益顯得清新豐富，多姿多采。此種文化發展的趨勢，歷經唐末、五代的過渡期，逐漸進入中國的近世期，終於形成了宋代的新文化，因此，欲探討宋代新文化的本質，必先着手於究明唐代文化的實態。

又唐文化更向四鄰諸國傳播，諸國也根據自己的傳統，斟酌吸收，使其本國文化加速發展，充分表現中古時期的國際文化交流，此點也顯示了唐代文化的特徵與價值，唯其牽涉範圍至廣，擬於日後另文論述。

五、結 論

唐朝帝國完成中國南北的統一，藉着完備的律令制度，穩固了帝國的基礎，造成了空前的繁榮與安定。由於唐朝皇室源於漢胡混血，又承北朝遺緒，經過了極深的胡化，遂能紓於華夷之辨，對於外族的態度是寬容善待，兼愛如一，所採取的政策是積極進取，關心夷事，於是唐德廣被，及於遐邇，唐天子不僅為中國人的皇帝，同時也是塞外諸族及西域各國的共同大君主，而擁有天可汗的尊號，於此世界帝國之中，中國唐朝與四周外族關係密切，不僅信使往來頻繁，而且外族相繼入唐，並活躍於中國社會，有居官任將者，有留學應科者，還有樂工、舞人、僧侶、商賈等。處於此種背景之下，外來文化源源流入中國，無論在風俗習慣、天文曆法、宗教信仰、樂舞美術、科學知識等方面，都受到深刻的影響。不過，唐朝是本著固有的傳統文化，再酌情吸收外來的各種文化，於是充實其內容，終成為一種富有濃厚國際多樣性特色的新文化，此為唐代文化特徵的顯示，亦為唐代文化價值的所在，實具有極重要的歷史意義。

附 註

註一：關於李唐皇族的源流，可參考劉盼遂李唐為蕃姓考（載於女師大學術季刊第一卷第四期）及陳寅恪李唐氏族之推測（載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紀念論文集）、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二月商務印書館上海初版發行）上篇統治階級之氏族及其升降等論文。

註二：張星烺中西交通史料匯編第一冊古代中國與歐洲之交通：「北方引弓胡人，侵入中原，與漢人雜婚，吸收漢人文化，取其菁華，而不染其暮氣，造成一新民族，朝氣勃勃，慄悍猛鷙，遇事進取，一有機緣，政治統一，則新國家乃更盛於前期矣。隋唐時代之中國，即如是造成者也。」

註三：見宮崎市定博士東洋樸素主義的民族與文明主義的社會（昭和十五年四月東京富山房發行）。

註四：資治通鑑卷一九四太宗貞觀七年十二月條：「戊午，還宮，從上皇置酒故漢未央宮。上皇命突厥頡利可汗起舞，又命南蠻酋長馮智戴詠詩，既而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

註五：試舉一例證之，唐會要卷十四獻俘條：「（貞觀）二十三年正月，阿史那社爾執龜茲王訶利布失畢，及其相那利等，獻於社廟。太宗釋之，以為左武衛大將軍。」

註六：欽定全唐文卷七十五文宗七太和八年疾愈德音：「南海蕃舶，本以慕化而來，固在接以恩仁，使其感悅，如聞比年長吏，多務徵求，嗟怨之聲，達於殊俗，況朕方寶勤儉，豈愛遐琛，深慮遠人未安，率稅猶重，思有矜恤，以示綏懷，其嶺南、福建及揚州蕃客，宜委節度觀察使，常加存問，除舶脚、收市、進奉外，任其來往通流，自為交易，不得重

加率稅。」

註七：資治通鑑卷一九九太宗貞觀二十三年五月條：「有頃，上崩。……四夷之人入仕於朝及來朝貢者數百人，聞喪皆慟哭，剪髮、髻面、割耳，流血灑地。」又同書同卷八月條：「庚寅，葬文皇帝于昭陵，廟號太宗。阿史那社爾、契苾何力請殺身殉葬，上遣人諭以先旨不許。」

註八：唐鑑卷二十四昭宗下范祖禹曰：「僖昭之時，惟李克用最爲有功，雖嘗跋扈，而終不失臣節，王室可倚以爲藩扞，使太原之勢嘗重，則諸鎮未敢窺唐也。而唐以其戎狄之人，疑而不信，外而不親，有震上之勢，而無朝廷之助，是以不競於汴，而全忠獨彊，吞噬諸鎮，卒滅唐室。」

註九：見有高巖唐代的社會與文藝（昭和二十三年二月大日本雄辯會講談社發行）。

註一〇：茲事亦見於資治通鑑卷一九三太宗貞觀三年〇十二月條，並稱所繪爲「王會圖」云。

註一一：新唐書卷四十六百官志兵部職方條：「職方郎中、員外郎各一人，掌地圖、城隍、鎮戍、烽候、防人、道路之遠近、及四夷歸化之事。……凡蕃客至，鴻臚訊其國山川風土，爲圖奏之，副上於職方，殊俗入朝者，圖其容狀衣服以聞。」

註一二：大唐西域記十二卷，共記一百三十八國，著者生動地描述各國的情況，使讀者如身歷其境。唯關於此書著者，學者間仍有議論。清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九十二新舊唐書西域記條云：「玉海第十六卷云：唐西域記十二卷，元奘譯，辨機撰。今佛藏有此，卷首並列二僧名。據舊事云云，則元奘所譯乃佛經，此書元奘自撰，何譯之有，辨機惡僧，豈能著書。玉海非是，藏本承其誤耳。」又可參見陳垣大唐西域記撰人辯機一書。

註一三：唐會要卷三十六修撰條：「辛臣賈耽撰海內華夷圖一軸，並序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四十卷，上之。耽好地理學，四方之使自蕃方來者，必問其土地山川之所終始，凡三十年，問既備，因撰海內華夷圖。」

註一四：禮記卷之四王制篇：「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

註一五：前揭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下篇外族盛衰之連環性及外患與內政之關係。

註一六：舊唐書卷三十八地理志：「開元二十八年，戶部計帳，……戶八百四十一萬二千八百七十一，口四千八百一十四萬三千六百九。」據此知開元之時，全國人口數爲四千八百餘萬，而貞觀三年之際，當未達此數，則一百二十餘萬的塞外來歸人口數，已占全國的四分之一以上。

註一七：參見拙稿唐朝起用外族人士的研究（大陸雜誌第三十八卷第四期）。

註一八：資治通鑑卷一九三太宗貞觀四年五月條：「丁丑，以右武衛大將軍史大奈爲豐州都督，其餘酋長至者，皆拜將軍、中郎將，布列朝廷，五品已上百餘人，殆與朝士相半，因而入居長安者近萬家。」

註一九：見趙翼陔餘叢考卷十七唐初多用蕃將條。

註二〇：唐會要卷二十六講武條：「開元八年八月勅：國家偃武教、修文德，百年于茲矣。……宜差使于兩京及諸州，揀取十萬人，務求灼然驍勇，不須限以蕃漢。」

註二一：關於四方外族助唐室討逆平亂的史實，可參見冊府元龜卷九七三外臣部助國討伐條的記載。

註二二：唐會要卷三十六附學讀書條：「開成元年六月勅：新羅宿衛生王子金義宗等所請留住學生員，仰准舊例留二人，衣糧准例支給。」

註二三：欽定全唐文卷七六七陳黯華心：「大初中年，大梁連帥范陽公得大食國人李彥昇，薦於闕下，天子詔春司考其才，二年，以進士第名顯。」

註二四：李內燾韓國史大觀第十三章新羅文化的瀾漫與其政治變遷：「崔致遠十二歲渡唐，十八歲及第，歷任內外官職，適黃巢亂起，充兵馬都統高駢的祕書官，擬就討伐黃巢檄文，義正詞嚴，淋漓痛快，文名遠震。」

註二五：見杉本直治郎阿倍仲麻呂傳研究（昭和十五年十二月六日東京育芳社發行）。

註二六：段安節樂府雜錄琵琶條：「貞元中，有康崑崙，第一手。」

註二七：太平御覽卷二二四職官部散騎侍郎條：「高祖初平長安，拜舞人安叱奴爲散騎侍郎，既在朝列，咸陪遊宴。禮部尚書李綱諫曰：臣案周禮，均工樂胥，不得預於士伍，……而先令舞胡，致位五品，鳴玉曳組，趨馳廊廟，故非創規模、貽子孫之道也。高祖不納。」

註二八：見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頌序。

註二九：洪邁容齋三筆卷七代宗崇尙釋氏條：「胡僧不空，官至卿監，爵爲國公，出入禁闥，勢移權貴，此唐史所載也。予家有嚴郢撰三藏和尚碑，徐季海書，乃不空也，云西域人，氏族不聞於中夏，玄、肅、代三朝，皆爲國師，代宗初，以特進大鴻臚褒表之，及示疾，又就臥內加開府儀同三司、肅國公，既亡，廢朝三日，贈司空。其恩禮之寵如此。」

註三〇：段成式酉陽雜俎續集卷五寺塔記上平康坊菩薩寺條載釋門故事云：「李右座（林甫）每至生日，常轉請此寺僧就宅設齋。有僧乙嘗嘆佛，施鞍一具，賣之，材直七萬。又僧廣有聲名，口經數年，次當嘆佛，因極祝右座功德，冀獲厚賜。齋畢，簾下出綵筐香羅帕籍一物，如朽釘，長數寸，僧歸失望，慙惋數日，且意大臣不容欺己，遂携至西市，示於商胡，商胡見之，驚曰，上人安得此物，必貨此，不違價。僧試求百千，胡人大笑曰，未也，更極意言之，加至五

百千，胡人曰，此直一千萬，遂與之。僧訪其名，曰，此寶骨也。」

註三一：李緯尚書故實（唐人說薈卷二所收）：「兵部李約員外管江行，與一商胡舟機相次，商胡病，固邀相見，以二女託之，皆絕色也，又遺一大珠，約悉唯唯。及商胡死，財寶約數萬，悉如其數送官，而以二女求配，始殮商胡時，約自以夜光舍之，人莫知也，後死商胡有親屬來理資財，約請官司發掘驗之，夜光果在，其密行皆此類也。」

註三二：參見業師佐伯富教授宋的新文化「民族的返老還童」章（東洋的歷史六，人物往來社）。

註三三：資治通鑑卷二二五代宗大曆十四年七月條：「先是回紇留京師者常千人，商胡僞服而雜居者又倍之，縣官日給饔飩，殖貨產，開第舍市肆，美利皆歸之，日縱貪橫，吏不敢問，或衣華服，誘取妻妾，故禁之。」

註三四：太平廣記卷二八六幻術條：「唐振州民陳武振者，家累萬金，為海中大豪，犀象玳瑁，倉庫數百。先是西域賈漂舶溺至者，因而有焉。……武振由是而富。」

註三五：唐會要卷七十二安北都護府條：「其後下詔議安邊之術，……朝士多同彥博議，上遂用之，封阿史那蘇尼失為懷德郡王，阿史那思摩為懷化郡王，處其部落於河南朔方之地，入居長安者，近萬家。」又王讜唐語林卷三識鑒條作「且萬家」，冊府元龜卷九九一外臣部備禦條作「數千家」，均相去不遠。

註三六：又資治通鑑卷一九六太宗貞觀十七年三月條，也有同樣的記事。

註三七：同註三一。

註三八：舊唐書卷七十六恒山王承乾列傳：「常命戶奴數十百人，專習伎樂，學胡人椎髻，剪綵為舞衣，尋槿跳劍，晝夜不絕，鼓角之聲，日聞於外。」所謂「學胡人椎髻」云云，似指倣效西域妝飾而言。

註三九：新唐書卷二十四車服志：「宮人從駕，皆胡冒乘馬，海內倣之，至露髻馳騁，而帷冒亦廢，有衣男子衣而韉，如奚契丹之服。」又姚汝能安祿山事迹卷下：「天寶初，貴游士庶，好衣胡服，為豹皮帽，婦人則簪步搖，袂衣之制度，衿袖窄小，識者竊怪之，知其戎矣。」

註四〇：據元氏長慶集（四部叢刊本）卷二十四樂府。

註四一：封演封氏聞見記卷六飲茶條：「御史大夫李季卿宣慰江南，至臨淮縣館，或言伯熊善茶者，李公請為之，伯熊着黃被衫、烏紗帽，手執茶器，口通茶名，區分指點，左右刮目，茶熟，李公為歡兩杯而止。既到江外，又言鴻漸能茶者，李公復請為之，鴻漸身衣野服，隨茶具而入，既坐教攤，如伯熊故事。」

註四二：見伊瀨仙太郎東西文化的交流「伊蘭風的唐文化」章（昭和四十四年七月十五日清水弘文堂書房發行）。

註四三：據分類補註李太白詩集卷六樂府（四部叢刊本）。

註四四：據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三三七四裔考疏勒國條注所引。

註四五：封氏聞見記卷六打毬條：「景雲中，吐蕃遣使迎金城公主，中宗于梨園亭子賜觀打毬。吐蕃贊咄奏言：臣部曲有善毬者，請與漢敵。上令仗內試之，決數都，吐蕃皆勝。時玄宗爲臨淄王，中宗又令與嗣虢王邕、駙馬楊慎交、武秀等四人，敵吐蕃十人，玄宗東西驅突，風回電激，所向無前，吐蕃功不獲施。」

註四六：徐松唐兩京城坊考卷三靖恭坊條。

註四七：向達長安打毬小考（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所收，燕京學報專號之二，民國二十二年哈佛燕京社出版）；羅香林唐代波羅毬戲考（唐代文化史研究所收，民國三十五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

註四八：唐語林卷七補遺條：「僖宗好蹴毬，鬪雞爲樂，自以能於步打，謂俳優石野猪曰：朕若試步打進士，當得狀元。」又資治通鑑卷二五三僖宗廣明元年二月條，也有同樣的記事。

註四九：唐兩京城坊考卷一大明宗條：「九仙門之外，有鬪雞樓、走馬樓。」

註五〇：見藪內清教授中國的科學文明（岩波新書，一九七〇年八月發行）。

註五一：所謂平朔，即是自前朔至後朔，中積二十九日五十三刻有奇也；所謂定朔，即是用日、月的實際運行，來定合朔的日期。如日行盈，月行遲，則日月相合必在平朔之後，日行縮，月行疾，則日月相合必在平朔之前，求得平朔，用盈、縮、遲、疾之差數來加減。

註五二：見桑原隲藏博士論隋唐時代來住於中國的西域人（原載內藤博士還曆祝賀支那學論叢，現收於桑原隲藏全集第二卷東洋文明史論叢）。

註五三：新唐書卷二十七上曆志：「時善筭瞿曇瞿者，怨不得預改曆事，（開元）二十一年，與（陳）玄景奏大衍寫九執曆，其術未盡。」

註五四：參見藪內清教授前揭書「科學文明的擴展」章。

註五五：王應麟困學紀聞卷九曆數條：「唐曹士蒼七曜符天曆，一云合元萬分曆，本天竺曆法。」

註五六：舊唐書卷三十三曆志求日月蝕虧初及復末時刻術條：「更籌迦葉孝威等天竺法。」

註五七：隋唐嘉話（唐人說薈卷一所收）：「太史令李淳風校新曆成，奏太陽合日蝕當既，於占不吉。太宗不悅曰：日或不蝕，卿將何以自處。曰：有如不蝕，則臣請死之。及期，帝候日於庭，謂淳風曰：吾放汝與妻子別。對以尙早一刻，指表影曰：至此蝕矣。如言而蝕，不差毫髮。」

註五八：羽田亨博士之解說云：「此書首部雖微有殘缺，殆存其全部，除卷首書題之外，於卷尾記有（七）星曆日一卷并十

二時。七曜或七星，即謂書中的蜜、莫空、雲漢、曜日、溫沒斯、氍毹、雞緩；十二時者，不外是謂配合此等各曜日的十二支時。而所述者，乃關於人類各種的行爲，並詳於七曜日及其十二時的吉凶禍福。」

註五九：同註五二。

註六〇：玄奘自長安啓程西遊，一般都作貞觀三年八月，但據梁啓超氏的考證，似應爲貞觀元年（見梁著中國歷史研究法第五章史料之蒐集與鑑別）。又前嶋信次著玄奘三藏（岩波新書），亦採元年之說。

註六一：舊唐書卷一九一方伎僧玄奘列傳：「在西域十七年，經百餘國，悉解其國之語，仍採其山川謠俗，土地所有，撰西域記十二卷。貞觀十九年，歸至京師，太宗見之大悅，與之談論，於是詔將梵本六百五十七部，於弘福寺翻譯，仍勅左僕射房玄齡、太子左庶子許敬宗，廣召碩學沙門五十餘人相助整比。」又可參見大唐西域記卷十二記贊。

註六二：詳見註一二。

註六三：舊唐書卷一六〇韓愈列傳：「（憲宗元和）十四年正月，上令中使杜英奇押宮人三十人，持香花赴臨臯驛迎佛骨，自光順門入大內，留禁中三日，乃送詣寺，王公士庶，奔走捨施，唯恐在後，百姓有廢業破產、燒頂灼臂而求供養者。愈素不喜佛，上疏諫曰：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始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並可參見新唐書卷一七六韓愈傳。

註六四：又參見舊唐書卷十八上武宗本紀。

註六五：並參見唐會要卷四十八寺條及資治通鑑卷二四八宣宗大中元年閏月條。

註六六：桑原隲藏全集第一卷東洋史說苑宗教篇所收。

註六七：在唐以前，稱爲火神、天神或胡天神，至唐初始創「祇」字，以示從天也。又陳垣火祇入中國考，謂祇字在玉篇示部倒數第十六字已有之，但那是宋代陳彭年所添增的字，至爲明顯。

註六八：見唐兩京城坊考卷三、卷四、卷五各坊條的記載。

註六九：張族朝野僉載卷之三：「河南府立德坊及南市西坊，皆有胡祇神廟。」

註七〇：見桑原隲藏關於祇教的一項史料（前揭書第一卷東洋史說苑宗教篇所收）。

註七一：張邦基墨莊漫錄卷四：「東京城北有祇廟，祇神本出西域，蓋胡神也，與大秦穆護同入中國，俗以火神祠之。……自唐以來，祇神已祀於汴矣，而其祀乃能世繼其職，踰二百年，斯亦異矣。」又同書同卷：「鎮江府朱方門之東城上，乃有祇神祠，不知何人立也。」

註七二：摩尼被處死的年代，近據摩尼教經典奧書，有作公元二七三年者，未知孰是。

註七三：據方豪中西交通史（民國四十二年六月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出版）第二冊第十九章唐宋之摩尼教，又引闕書卷七方域志云：「慕闍當唐高宗朝行教中國，至武則天時，慕闍高弟密烏沒斯拂多誕復入見，羣僧妬譖，互相擊難。」則在高宗時摩尼教徒已入唐，早於佛祖統記所載，未知孰是。

註七四：參見志磐佛祖統記卷四十一法運通塞志代宗條，及同書卷五十四歷代會要志事魔邪黨條。

註七五：冊府元龜卷九九外臣部請求條：「憲宗元和二年正月庚子，迴鶻使者請於河南府、太原府置摩尼寺三所，許之。」

「此事又見於舊唐書卷十四憲宗本紀及唐會要卷四十九摩尼寺條，唯二書均略「三所」二字。

註七六：見舊唐書卷一九五迴紇傳。

註七七：見方豪前揭書。

註七八：舊五代史卷十梁末帝紀：「不食葷茹，誘化庸民，揉雜淫穢，宵聚晝散。」

註七九：唐會要卷四十九摩尼寺條：「貞元十五年四月，以久旱令摩尼師祈雨。」並見於舊唐書卷十三德宗本紀，唯摩尼師

作「陰陽人」。

註八〇：佛祖統記卷四十二法運通塞志梁末帝條：「（貞明）六年，陳州末尼聚眾反，立母乙為天子，朝廷發兵擒母乙，斬之。其徒以不茹葷飲酒，夜聚淫穢，畫魔王踞坐，佛為洗足，云佛是大乘，我法乃上上乘，其上慢不法有若此。」又舊五代史卷十梁末帝紀，載其事更詳。

註八一：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為景教的重要文獻，於唐德宗建中二年（781）所立，由大秦寺僧景淨撰述碑文，分序、頌二段，俱為漢文，碑之正面及兩側附有敘利亞文的人名與教職。此碑於明熹宗天啓五年（1625）在西安出土，原碑現存西安金勝寺，日本京都大學文學部陳列館及高野山奧院，各藏有模造碑。

註八二：景教碑文又云：「肅宗文明皇帝，於靈武等五郡，重立景寺，元善資而福祚開，大慶臨而皇業建。代宗文武皇帝，恢張聖運，從事無為，每於降誕之辰，錫天香以告成功，頒御饌以光景衆，且軋以美利，故能廣生，發以體元，故能亨壽。」

註八三：Chai Lieu Liu, *The Arabian Prophet*, Tr. by Isaac mason, p. 93.
（據劉伯驥中西文化交通小史所引）。

註八四：據鄧之誠中華二千年史卷三。

註八五：此事又見唐會要卷一百大食國條。

註八六：關於阿拉伯人取道海路來中國諸海港貿易通商的事，桑原博士滿壽庚的事蹟（前揭全集第五卷所收）一書，敘述綦

(266)

詳。

註八七：此事根據公元十四世紀初葉阿拉伯遊歷家阿布賽特哈桑 (Abu Zaid Hassan) 的記載。

註八八：新書卷一〇九樂志五：「世祖……後通西域，又以悅般國鼓舞，設於樂署。」又同書同卷：「太和初，……樂部不能立，其事彌缺，然方樂之制及四夷歌舞，稍增列于太樂。」

註八九：通典卷一四二樂二歷代沿革下條：「(北齊)後主唯賞胡戎樂，耽愛無已。於是繁習淫聲，爭新哀怨，故曹妙達、安未弱、安馬駒之徒，至有封王開府者，遂服簪纓，而為伶人之事。」

註九〇：同書卷一四六樂六四方樂條：「周武帝聘突厥女為后，西域諸國來賸，於是有龜茲、疏勒、安國、康國之樂。帝大聚長安胡兒，羯人白智通教習，頗雜以新聲。」

註九一：朝野僉載卷之五：「太宗時，西國進一胡，善彈琵琶，作一曲，琵琶絃撥倍麗。上每不欲番人勝中國，乃置酒高會，使羅黑黑隔帷聽之，一遍而得，謂胡人曰：此曲吾宮人能之。取大琵琶，遂于帷下令黑黑彈之，不遺一字。胡人謂是宮女也，驚歎辭去，西國聞之，降者數十國。」

註九二：詳見太平御覽卷五八四樂部二十二箏篋篋條及樂府雜錄箏篋條。

註九三：見向達西域傳來之畫派與樂舞(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所收)。

註九四：見石田幹之助胡旋舞小考(長安之春所收，東洋文庫91)。

註九五：樂府雜錄舞工條末段注云：「字舞以舞人亞身，於地布成字也。花舞着綠衣，偃身合成花字也。馬舞者，隴馬人着綵衣，執鞭於牀上，舞蹀躞蹄，皆應節奏也。」

註九六：欽定全唐詩第八函第五冊張祐二。

註九七：白氏長慶集(四部叢刊本)卷五十三律詩一。

註九八：同前揭卷五十五律詩三。

註九九：劉夢得文集(四部叢刊本)卷五雜體詩。

註一〇〇：沈下賢文集(四部叢刊本)卷一賦。

註一〇一：見石田幹之助前揭書。

註一〇二：舊唐書卷二百上安祿山列傳：「晚年益肥壯，腹垂過膝，重三百三十斤，每行以肩膊左右，擡挽其身，方能移步。至玄宗前作胡旋舞，疾如風焉。」

註一〇三：新唐書卷二十一禮樂志：「胡旋舞舞者立毬上，旋轉如風。」又舊唐書卷二十九音樂志所載文字，則與通典完全

相同。

註一〇四：元氏長慶集（前揭）卷二十四樂府胡旋女：「天寶欲末胡欲亂，胡人獻女能胡旋。旋得明王不覺迷，妖胡奄到長生殿。胡旋之義世莫知，胡旋之容我能傳。蓬斷霜根羊角疾，竿戴朱盤火輪炫。飄珠迸珥逐飛星，虹暈輕巾掣流電。潛鯨暗噓宜海波，回風亂舞當空靄。萬過其誰辨終始，四座安能分背面。」又白氏長慶集（前揭）卷三新樂府胡旋女：「胡旋女、胡旋女，心應絃、手應鼓。絃鼓一聲雙袖舉，迴雪飄颻轉蓬舞。左旋右轉不知疲，千匝萬周無已時。人間物類無可比，奔車輪緩旋風遲。」

註一〇五：長安之春（前揭）所收。

註一〇六：欽定全唐詩第七函第九冊劉言史。

註一〇七：同前揭第五函第三冊李端一。

註一〇八：德川光圀大日本史卷三四七至卷三四九禮樂志十四至十六，記述自隋唐傳來之樂曲甚詳。又可參考細川潤次郎古事類苑樂舞部六至八唐樂樂曲項。

註一〇九：楊慎畫品卷一花竹條：「又張僧繇畫于一乘寺，遠望眼暈如凹凸，近視即平。」

註一一〇：又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卷九：「尉遲乙僧，于闐國人，父跋質那，乙僧國初授宿衛官，襲封郡公，善畫外國及佛像，時人以跋質那為大尉遲，乙僧為小尉遲。畫外國及菩薩，小則用筆緊勁，如屈鐵盤絲，大則灑落有氣槩。」

註一一一：羅香林景教徒阿羅憾等為武則天皇后營造頌德天樞考（唐元二代之景教所收）：「其造模之毛婆羅，從其命名觀察，當為來自印度之蕃客。」又云：「武則天之建造天樞，雖曰本由武三思發動，而由姚璹為督作使，毛婆羅造模，然其間曾特為策劃而關係最鉅者，則殆為由波斯入唐之阿羅憾氏。」

註一二：見神田喜一郎敦煌學五十年（一九七〇年七月三十日筑摩書房發行）。

註一三：阮元疇人傳卷十三翟雲悉達：「其算法用字乘除，一舉札而成，凡數至十，進入前位，每空位處，恆安一點。」

註一四：孫真人備急千金要方序：「以為人命至重，有貴千金，一方濟之，德踰於此，故以為名也。」

註一五：見西陽雜俎卷二玉格條。

註一六：劉夢得文集（前揭）卷七送僧詩。

註一七：淡海真人元開唐大和上東征傳：「時和上頻經炎熱，眼光暗珠，爰有胡人，言能治目，遂加療治。」

註一八：資治通鑑卷二〇三高宗弘道元年十一月條：「上苦頭重不能視，召侍醫秦鳴鶴診之，鳴鶴請刺頭出血可癒。天后在簾中，不欲上疾癒，怒曰：此可斬也，乃欲天子頭刺血。鳴鶴叩頭請命，上曰：但刺之，未必不佳。乃刺百會腦戶

二穴，上曰：吾目似明矣。」

註一九：見趙翼二十二史劄記卷十九唐諸帝多餌丹藥條。

註二〇：酉陽雜俎卷七醫條：「王元榮俘中天竺王阿羅那順以詣闕，兼得術士阿羅邇娑婆，言壽二百歲，太宗奇之，館於金鷄門內，造延年藥，令兵部尚書崔敦禮監主之。」

註二一：詳見太平御覽卷二二一職官部黃門侍郎條。

註二二：查張星烺中西交通史料匯篇所列大秦國等五處的鑛石、動植物名稱，計鑛石三十七種，動物三十一種，植物一百九種。

註二三：所謂中國三大發明，即羅盤針、印刷術、火藥。

註二四：見羅香林唐元二代之景教。

註二五：舊唐書卷一九八西戎列傳拂林國條：「至於盛暑之節，人厭囂熱，乃引水潛流，上徧於屋宇，機制巧密，人莫之知，觀者惟聞屋上泉鳴，俄見四簷飛溜，懸波如瀑，激氣成涼風，其巧妙如此。」

註二六：冊府元龜卷二帝王部誕聖條：「（貞元）十二年四月庚辰，帝降誕之日，近歲常以其日會沙門、道士于麟德殿講論。帝每謂三教與儒教所歸不殊，但內外跡用有異爾。是日，兼召儒官給事中徐岱、兵部郎中趙需、禮部郎中許孟容、四門博士韋渠牟，與沙門談，延道士萬參成等數十人，迭昇講座論三教，初如矛戟，森然相向，後類江河，同歸於海，帝大悅，頒賜有差。」

註二七：唐會要卷三十四雜錄條：「至先天二年十月，中書令張說諫曰：……且乞寒潑胡，未聞典故，裸體跳足，盛德何觀，揮水投泥，失容斯甚，法殊魯禮，褻比齊優，恐非干羽柔遠之義，樽俎折衝之道，願擇芻言，特罷此戲。至開元元年十月七日勅，臘月乞寒，外蕃所出，漸浸成俗，因循已久，自今已後，無問蕃漢，即宜禁斷。」

註二八：同註三。

註二九：羅香林唐代文化的新認識（前揭唐代文化史研究所收）。

註三〇：羽田亨隋唐時代的文化（羽田博士史學論文集上卷歷史篇所收）。